

妹尾達彦著：《長安の都市計画》

王力平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中图分类号：K 文献标识码：A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是日本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个别研究”时代,都城史与制度史、地域史、敦煌吐鲁番社会等领域一样,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数量都有很大的提高¹。2001 年 10 月,講談社出版了妹尾達彦《長安の都市計画》一书,又为古代都城研究增添了一部新作。

妹尾達彦主要致力于中国都市史的研究,近年来已经发表了多种这方面的学术论文和专著²,在日本有“中国都市史研究第一人”之誉。

《長安の都市計画》,全书由三章构成。在第一章《ユーラシア大陸の 3 つの都》(《欧亚大陆三都》)中,作者首先提出了“历史即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史”的命题,并强调他本人的研究旨趣,在于探讨人与环境的关系,即尝试用一种能够将整个地球史与详述某一地区的地域史相结合的新的叙述方式。作者发现,自公元前 2000 年开始到公元十五、六世纪,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欧亚大陆曾反复出现游牧民族自东向西的、长距离、大规模的迁徙活动,这在世界各大洲中是罕见的,也带来了欧洲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东亚文明的激烈碰撞和融合。其中 4—7 世纪鲜卑族自北方草原南下,9 世纪土耳其人的西迁,13 世纪蒙古人的远征等,都对中亚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

作者重点考察了 8—9 世纪欧亚大陆三大著名都市——长安、君士坦丁堡、巴格达。在当时,这三大名都具有汇集最高文明成果、融合多种文化、人口繁多以及处于经济文化中心和世界性宗教圈中心等共同点。总之,在第一章中,作者从自然地理与生态环境,政治与文化地理等多个视角来考察隋唐长安出现的历史背景,实际上是作者对世界史、中国史的基本认识的理论阐述,也是其隋唐长安研究的切入点。

第二章《長安は、宇宙の都として設計された》(《被设计为宇宙之都的长安》),长达 67 页,分为《都市のデザイン》(《都市的设计构思》)和《王都は正統性を主張する》(《王都主张正统性》)两个小节,是全书重点论述的部分。作者认为:4—7 世纪欧亚大陆的变动、特别是鲜卑人的迁徙,直接与隋唐长安的历史变迁有关。在中国陷于南北分裂的背景下,鲜卑族在北方建立了北魏政权。以后的隋唐政权也是由混有胡族血统的军事贵族建立的王朝。而隋文帝重建大兴城的目的,不仅在于强化隋朝的治安和军事防御能力,同时还在于强调杨氏隋朝的正统性,以改变所谓南朝承汉正朔的偏见。在这一部分,作者还从考古发现考察了长安的整体构造,以及隋、唐长安存在着的异同。作者发现:棋格模式是隋、唐长安所共有的特征,而采用这种模式的原因,首先是与鲜卑族入主中原后注重继承和吸收汉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关,此外,西北地区干燥的气候条件也适合于版筑。至于棋格模式的思想内涵和象征意义,更是十分丰富的,它不仅包含了传统儒家的宇宙观和《周礼》中理想都城的成分,同时还包含了《周易》中具有调和自然与文化功能的阴阳五行思想,以及给空间注入生命的风水说等等。看来,在长安都城设计和建立之初,统治者更注重仪礼功能的发挥,试图使皇都具有摹写宇宙、联系上天与人世间的功能。总之,强调和体现隋唐王朝的正统性,是长安都城设计理念的核心。

如果说,作者在第二章中侧重于考察长安的设计思想和象征意义,那么,在第三章《住民が、長安を生活の都に変えた》(《居民将长安变成了生活之都》)中,作者则侧重于隋唐长安都城政治功能的转变,以及社会各阶层的居住地域及其变动过程。在第一节《宇宙の都から生活の都へ》(《从宇宙之都到生活之都》)中,作者注意到,9 世纪以后,长安社会文化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如道教开始抬头,祭天礼和南郊仪礼等各种王朝礼仪也开始注重强化社会统和功能,重视道德伦理教化功能的发挥,同时,世俗倾向增加,如公主的出嫁仪式、迎佛骨仪式等,都十分大众化,带有享乐性,动辄万人空巷,出现大众高度兴奋、狂热的场面。特别是 9 世纪以后,士人阶层的思想活动出现了某些新变化,如华夷之辨思想以及复古、怀旧的思想开始抬头,思想意识方面呈现出某种排他性。作者认为,这些变化与安史之乱后唐朝所面对的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有关,在当时,河北三镇实际上已经脱离中央而独立,南

诏、吐蕃等周边民族政权的领土扩张，造成唐朝疆域的急剧萎缩，武宗会昌大举灭佛以及祆教、摩尼教的被禁止，都标志着唐朝作为君临东亚的大帝国的时代已经结束，其国际性和典范性已经消失。总之，9世纪长安思想界的变化，与唐朝在世界历史中地位的改变，存在着直接关系。种种迹象表明，到唐朝后期，长安都城原本具有的摹写宇宙、显示王朝正统性的功能以及联系上天与人世的桥梁作用，都已经弱化。

在对社会各阶层的居住地域及其变动过程的动态考察中，作者选取了以下三则有代表性的史料，即宋敏求的《长安志》、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及唐末到访长安的伊斯兰商人的见闻录（P199-201），考察了8世纪前期官僚阶层的居住状况、长安高级商业区的变迁以及长安东西区居民的生活样式。通过分析、比较，作者认为长安出现了居民按社会阶层选择居住区的倾向，形成了所谓“精英区”与“平民区”。而这种现象的出现，首先与科举制度的影响有关，文人举子为实现所谓“长安梦”而竞逐科场，云集首都；其次则与长安人口增加，工商业发达，商贾往来频繁以及坊制的松弛等因素有关。

近年来，国内外有关隋唐长安研究的新作迭出，其中一些著作以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为基础，在增补校订坊里史料，考察宫城和皇城建置沿革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³。还有从长安市民生活、“胡风”对城市文化的影响以及科场风习等方面来考察唐代长安的著作⁴。但总的看，考察都城制度沿革之作与论说城市社会文化生活变迁之作，似乎是畛域分明，能够将两者结合起来的综合研究还较少见。

妹尾達彦的《長安の都市計画》，初看起来，“学域”边界似乎有些模糊，因为它涉及方面广泛，有关自然环境、中亚历史地理及都城文化的内容占据了相当篇幅。此外，这应该说是一部深入浅出的带有普及性的作品。但是由于作者在此前已经有多篇古代都城研究方面的专门论文发表，故此书的学术性还是显而易见。作者以世界史的整体眼光，通过地理环境、民族迁徙、社会思想演变等多个角度来考察隋唐长安，在综合性以及多学科交叉研究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在书中，作者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观点，如作者将9世纪以后唐朝统治空间的盈缩，与长安社会生活的变化相联系，并指出唐后期士人思想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宋代思想学术的面貌。这一认识无疑是有启发性的。“平日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白居易《西凉伎》）。唐前后期疆域的这种巨大变化，确实对9世纪以后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应该成为政治史研究的重大课题。比较而言，统治空间的丧失及其给唐人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应该是浅显而易发现的；而由统治空间丧失带来的“丧失感”，亦即唐人精神世界和思想意识的变化，则是深潜而不易考察的。就这两个方面特别是后者来说，学界现有的研究显然是不够充分的，还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在写作方法方面，妹尾達彦也自有其长处。本书的部分章节，明显地带有游记风格。作者将其自青年时代起利用“休学旅行”探访欧亚大陆名胜古迹的经历穿插于全书中，文笔细腻优美，增添了作品的亲切感。此外，图的运用也是本书的一大特点。全书共有插图66幅，大多为作者自己设计、绘制，也有些是直接引用或经作者修改过的他人之作。每幅图都注明了文献或史料的依据。有些示意图，如图9“世界历史の第二期”（P40），图40“宇宙の都”（P139）等，通过富有创意的构思，收到了文字表述所难替代的效果。此外，在书的卷末附录部分，作者用6页篇幅，编辑了“長安を知るための読書案内”，即从宋代至今，包括中国学者、日本学者以及部分西方学者的长安研究成果“指南”，不仅为这个题目的后继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实际上也是有关长安研究的学术史的扼要介绍。

当然，此书涉及的某些问题，似乎还有继续探讨的余地。例如，作者明确地将隋政权与北魏政权同视为鲜卑文化的代表，认为“由拥有鲜卑系和匈奴系血统的隋王朝完成了中国大陆的再统一，并建立了新都大兴城”（P59；同义的表述还见P84，P101）；此外，作者还认为，9世纪以后，唐文化的主流，开始从欧亚大陆共有的游牧民族的普遍性质，向中国固有的汉传统文化复归（P188）。这些提法，令人很自然地联想到隋唐王朝的种族与文化属性问题。就杨隋先世的血统问题来说，尽管有史学家对隋文帝自称是汉太尉杨震第14代孙表示怀疑，但杨坚父杨忠系汉族，西魏时被赐鲜卑姓“普六如氏”，母吕氏，亦汉族，均无胡族

血统。即便至杨坚时代，开始与独孤氏联姻，子孙一代也并非纯粹胡族血统。而从杨坚、杨广父子钦慕南朝文化，宗室子弟多有深厚诗书修养来看，很难将杨氏隋朝视为鲜卑军事贵族。诚然，都城史也是建筑史，是建筑师、设计师作品的历史，而研究都城的设计者家族学术背景，无疑是审视都城设计思想的一个独特的视角。唐长安制度多承自隋大兴城，而设计建造大兴城的宇文恺、阎毗、何稠等人，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他们的西域胡族血统和文化背景，对隋唐长安的设计自然会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对此，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附论”《都城建筑》中指出：虽然宇文恺等人“俱含有西域胡族血统”，但其“久为华夏文化所染习，故其事业皆藉西域家世之奇技，以饰中国经典之古制”。陈氏还以“西域奇技”为“用”，“中国经典”为“体”来比喻两者间的关系，与唐人自己所说的“长安有胡风”，都是比较接近历史实际的说法。可否这样理解：与其说隋唐长安的设计，是鲜卑民族融合汉文化的产物，毋宁说是汉文化吸收了若干西域文化元素的结果。

此外，作者认为：近代国家与前近代国家首都的机能和象征意义，基本上是不同的。十九世纪以后的近代国家的首都，是军队、警察、政治的中心，而在前近代，王都不过是最多数军阀的军事据点之一而已（P92—93）。然而，倘若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中国古代的都城，情况却有所不同。首先，隋唐长安是中国历史上的典型城市，据文献和考古发掘，从整个城市宫殿区所占的地位、封闭式的坊市和受到严格控制的市场来看，这种封建城市与欧洲中古时期的城市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其次，以唐朝为例，在皇权和中央政权高度集中的时期，首都对地方的控制以及军事上的防御功能是十分突出的，比如前期的兵府多集中在关内道及其外围地区，里坊制度甚至也有军事管制的倾向，等等。这些现象都表明，“前近代”的中国都城，也有军队、警察、政治中心的作用，而政治军事功能远远大于经济功能，一直是中国古代都城的特点之一。

收稿日期：2003-10-31

作者简介：王力平，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¹ 参考谷川道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史の基本問題總論》，载《中国史學の基本問題》丛书第二卷《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史の基本問題》，日本汲古書院 1997 年 6 月。

² 妹尾達彦 1952 年生，毕业于立命馆大学文学部，在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筑波大学人类学部、中央大学文学部执教。主要著作有《岩波世界歴史講座》之九《中華の分裂と再生》（岩波书店，1999 年），《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制度と社会》（刀水書房，1996 年）等。20 世纪 80 年代，曾在陕西师范大学留学，为 1997—99 年间中日历史地理合作研究项目“中国黄土高原的都城与生态环境变迁”日方负责人。有关他的著作和论文目录，详见本书 P242 “唐代長安についての筆者の論文”。

³ 如杨鸿年著《隋唐两京坊里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9 月；辛德勇著《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1991 年。

⁴ 如黄新亚著《消失的太阳——唐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出版社，1996 年。